

中国古代林业管理机构的历史演变

□ 李 莉

中国古代林业管理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开端可追溯到先秦周朝，林业事务根据职能不同被分属多个部门，司爨、遂人、封人、野庐氏、山虞、林衡等职官，涵盖森林防火、用火、树木种植、森林利用等诸多林业事务，在山林资源利用、林业资源管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林业管理机构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演变。通过深入分析周朝之山虞林衡、隋唐之虞部司、明清之虞衡司的职官机构、职责制度以及管理体系，可发现其内在的演变特点。

周朝之山虞林衡。周朝政府之职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已具有初期的社会管理。天官冢宰，居于六卿之首，其职责为“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其中第三职就是虞衡。虞衡为九职之一，具体在负责土地、赋税等经济事务的地官大司徒之下运作。《周礼·地官·山虞》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的职责为制定山林管理禁令，冬伐阳坡之木，夏砍阴坡之木，并对盗伐林木者实行惩罚，属于行政长官。据《周礼·地官·林衡》载：“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斫木材，则受法于山虞，掌其政令。”可见，具体负责执行山虞政令的官员是林衡，掌管巡视林麓，调配守护林麓的人员，按时考核护林人员功绩，赏优罚劣。

根据山林川泽情况的不同，在山虞与林衡下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结构，属下的职员人数不等。《周礼·地官》中记载：“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还载有：“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士为周时的低级贵族，府掌

文书，以其主控各部门业务；史掌祭祀，类似秘书；胥为什长，是基层管理人员；徒为使役，即基层工作人员。根据山川和林麓大、中、小的不同，山虞和林衡下配备级别、结构、规模不同的属吏。

可见周代已经建立了层级分明、职能清晰、分工明确的林业管理机构及体系。山虞职责偏重于“立法”，林衡职责偏重于“执法”，两者分工配合，各司其职。这种配合加强了部门间的合作，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协调区域间的林业管理。

隋唐之虞部司。隋朝改变前朝政府设置格局，进行了新的官制改革，创三省六部制管理体制。《隋书·百官志》载：“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虞部司由工部所辖，掌管林业行政、山泽资源保护、营造森林以及田猎采捕政令。

唐承隋制仍在工部下置虞部。《新唐书·百官志》载：“工部尚书……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对虞部之职责，《唐六典》中规定得极为详尽：“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饕餮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藉，秋实之登，不得焚燎。”由此可知，那时虞部的职责主要是林业政令的制定、森林资源的保护以及田猎采捕之事宜，已经集管理、生产、保护、保育于一身。唐朝林业职官机构及其职责，比隋朝更分明，其下属机构的分工也比隋朝更为明确细致。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封建王朝经过长期实践而采取的一种新的政府管理体制，较前代的政府机构设置来看，更灵活、高效，在林业管理方面，六部的各司对有关寺监的分工明确具体。工部在具体工作中又得到将作、少府二监配合，这种配合可以加强部门间合作，更能有效促进林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明清之虞衡司。明代由皇帝直接

负责管理六部。六部系统地位得到大幅提升，虞部仍属工部。明之虞部于洪武二十九年改为虞衡司。清承明制，工部辖四清吏司，虞衡为其中之一。

明代虞衡司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其主要职责为“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虞衡司郎中一员，员外郎二员，内一员管街道沟渠”。可见其所主管事务，不仅包括林业还涉及环境事宜。清代虞衡清吏司职掌与明朝相似，其管理体系为“虞衡清吏司郎中满洲四人，汉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洲四人，汉一人；主事满洲三人，汉一人”，满汉共治，但其职责仍是规划、监督而不负责实际执行。而推行之任，全在地方官。知县或县令为最基层的地方长官，林业事务也是其职责之一，且多与官员的考核相关。

六部地位的提升，使得林业管理工作能够直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有利于林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时也能有效地加强林业管理机构上下级之间，以及林业管理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与配合，从而提高林业管理工作的行政效率。

在继承中发展的演变特点。从周朝的山虞林衡，到隋唐时期的虞部司，再到明清时期的虞衡司，虽然管理机构和体系繁杂不一，职官称呼及职责制度也各有异，但在职官机构、职责制度以及管理体系方面亦呈现出在继承中发展的演变特点。

在职官机构方面，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职官的名称，在先秦时期就设立。秦建国之后，因政务大权集于中央，地方上置郡设县，分地巡守，掌管林务之山虞林衡被取消，而森林由中央直接管理，由总理皇室一切事务的少府统辖。汉代在少府下短暂设立水衡都尉，管理上林苑（皇家园林）与林业。曹魏时，虞部在继秦汉被裁撤之后重新得到设置，之后一直是主要的林业职官。隋唐以后，古代林业职官机构尽管随着政权更迭不断变化，但基本是隋唐林业职官机构的沿袭，只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

健全和完备。

在职责制度方面，先秦时期森林资源丰富，周朝的山虞林衡主要职责是管理森林资源的取用以及森林防火等事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林业职官的职责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由采伐管理逐步统一到林木保护方面，并进一步延展到环境保护事宜。历代林业职官主要职责为林业政令的制定及政令执行的监督，政令的具体执行由基层长官和人员来落实。在政令的制定和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一脉相承地遵循“以时禁发”的制度。在长期的农林生产实践中，先民观察自然，结合“阴阳五行说”的理论，强调“时”的重要，强调利用森林资源时要顺其本性，顺其自然，因时而动，多有以时禁发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相关规定。这种以时禁发的林业传统，实际成为一种不成文法或习惯法被沿袭。由此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体现出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智慧。

在管理体系方面，周朝设置山虞林衡时，其下就形成了细致的分工，为后代林业管理体系的演变提供了依据，是科学规范管理山林的初始。这种管理体系既有上下层级纵向关系，也有横向部门间平行关系。隋唐的虞部司和明清的虞衡司，都呈现出这种纵横交织的特征。林业管理体系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尤其到了清朝，还呈现出了“满汉”交融的多民族共同治理的时代特征。在管理过程中还形成奖惩分明的考核系统，形成有效的林业官员管理，并由国家向地方一级级地贯彻下去，可以有效推动林业政令的贯彻实施，同时也能得到有效的反馈。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史研究室教授）



意大利汉学家兰乔蒂：从传统汉学到现代汉学的承继

□ 胡文婷

意大利汉学常被认为古老又年轻。它的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的马可·波罗播下的汉学种子。16世纪的利玛窦、罗明坚等意大利耶稣会士通过编纂词典、典籍译介、撰述著作等方式让汉学生根发芽，推动了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随着17世纪“国王数学家”来华，以及19世纪法兰西学院派的兴起，欧洲汉学研究中心转移至法国，意大利的汉学研究一度陷入沉寂，该局面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观，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意大利汉学由古续今的这个过程中，汉学家兰乔蒂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超越汉学传统，全面讲述中国。兰乔蒂的求学之路不乏汉学大家，他先后师从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华嘉，以及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及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这些学者或专于语言与文学，或精通历史与哲学，他们对兰乔蒂进行了全面且国际化的学术栽培，为他明晰汉学发展脉络，继承甚至超越汉学传统奠定了学理基础。兰乔蒂十分重视整理汉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他的《意大利汉学：从1945年至今》与白佐良的《1600—1950年的意大利汉学》互为补充，勾勒出意大利汉学的历史进程。

在梳理学术史的同时，兰乔蒂还发表相关文章如《何为汉学?》《汉学研究导论》等来思考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他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和有效性进行了有益探索，亦对汉学家展开历时性分析，明确区分了汉学家和“中国爱好者”的不同。基于汉学研究的范围广度和时间长度，他提出汉学实为对中国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包括语言学、历史、文学、地理、宗教、哲学、科学等内容，而汉学研究者欲展开原创性研究，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技能，还应有专业的方法论和全球化的学术视野。由此，兰乔蒂突破了以往汉学研究的局限，极大拓宽了意大利汉学的发展空间。

兰乔蒂的学术著作和翻译评论百余种，内容涉猎广泛，其中对中国法律、音乐、建筑、考古等的研究，突破了汉学传统中对文学、历史、语言的既有关注，从多个维度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另外，他积极推动《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的编纂，为意大利及西方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打开了窗口，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文本资源。

拓宽学术边界，创新研究方法。兰乔蒂对汉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在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受到传教士汉学的影响，他对《论语》《诗经》《庄子》等中国经典文本或继续翻译或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基于专业汉学的转向，开始侧重叙事文学的发展，他在《中国文学》中将叙事文学作为单独一节进行了论述，探析传奇、变文（古代说唱文学体裁）、话本与戏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而在厘清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之外，兰乔蒂还将目光投之于外，考察了中国叙事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具体影响，以及西方叙事文学又如何通过日本翻译传入中国并推动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从而描绘出历史文化交流的多维度脉络。而兰乔蒂对中国文学边界的扩大还表现在对自传体的关注，探索传统文学中尚未被充分重视的领域，他不仅梳理了中国自传文学从最早的以集体与道德为核心的叙述形式向更个人化及反思性的转变路径，还分析了背后的哲学、佛教等方面的复杂动因。

在研究中国文学过程中，兰乔蒂还积极打破学科的藩篱，探索跨学科及交叉研究的可能性。比如在《中国古文獻中的“海”》中，他综合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学科来梳理文本作品中“海”的概念，揭示其文化隐喻特征。另外，兰乔蒂通过深入分析儒家文本中所蕴含的审美原则、特征及演变，来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孔子的文学观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与批评理论的原点，而王充的《论衡》中的“疾虚妄”“务实诚”以及文学的“真美观”和社会功用，都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审美内涵，《文心雕龙》则是中国文学理

论的里程碑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还引入了比较视角以打通中西古今的时空界限，从而对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学观念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见解，挖掘出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价值。

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后备力量。兰乔蒂认为1945年之后的意大利汉学是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因为这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再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猎奇，而是源自文化和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意大利传统的三大汉学中心罗马智慧大学、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开始迎来蓬勃发展的阶段，而兰乔蒂先后在这三所大学任职，身体力行地搭建学术平台和培养汉学人才。他担任了《东方与西方》《中国》等期刊主编，发表了关于中国的系列研究成果，使其成为意大利汉学界的主要发声平台。这些期刊不仅关注古代中国、亦回应当下，力求客观、全面地向意大利读者介绍中国。1979年，兰乔蒂创建了意大利汉学协会并担任秘书长，定期组织年会和国际会议展开研讨，希冀欧洲汉学研究可以互通有无，有效促进了汉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兰乔蒂一直认为语言是认识他国文化的基础，曾呼吁在高中推广汉语并参与《汉意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该词典于2008年出版发行，至今仍是意大利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书。在他的热情号召和谆谆教诲下，一批批年轻人投身汉学研究，甚至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威尼斯学派。这些新生代在掌握汉语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研究中国的新视角和新方法，逐渐成长为意大利当代汉学的中坚力量，比如萨巴蒂尼和李集雅等知名汉学家。

兰乔蒂既是意大利传统汉学的接力者，也是意大利现代汉学的开拓者，多年来通过汉学研究坚持不懈将中国全面介绍给意大利读者。他的笔触既有传统中国的厚重，亦有当代中国的活力，使得东西两大古代国互识互动互鉴的历史更好延续。

海外汉学家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记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我们将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推出一批具有辽宁辨识度的改革举措和经验成果，以改革“硬举措”优化“软环境”、激发新活力。坚决贯彻“两个毫不动摇”，落实落细民营经济支持政策，构建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展严格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让民营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协同创新中央企业与地方合作模式，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重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落实勇于争先的重要要求，必须牢牢抓住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这个重要引擎。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既沿海又沿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最具开放基因、开放潜能、开放活力的省份之一。我们将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着力打造国家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参与中日韩经贸合作，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与中亚、欧美对接合作，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不断拓展开放新空间。建好用好对外开放平台，深入实施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水平举办中国辽洽会、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积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与京津冀地区融合对接，深化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地区等的战略合作，完善对口合作机制，加强东北三省一区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整体实力。

落实勇于争先的重要要求，必须牢牢抓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个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辽宁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底子较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辽宁全面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科学统筹精准施策，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构建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推动粮食高产稳产，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把农业建成具有竞争力的大产业，打造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推进以县城为载体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乡村公共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布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培育一批农业特色县、工业强县、文化旅游强县，形成强县引领、产业融合、竞相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一体推进“一圈一带两区”建设，加快推进沈阳建设“一枢纽、四中心”，推进大连“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提质升级，强化沈阳、大连“双核”联动带动作用，建设沈大经济走廊，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落实勇于争先的重要要求，必须牢牢抓住增进民生福祉这个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辽宁人民群众冷暖，这次考察期间专门对民生保障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我们扎

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全省城镇新增就业连续3年超过46万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老一小”保障网织密筑牢。我们将继续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价值追求、奋斗指向，以三年行动胜利成果更好惠民利民。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做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一老一小”这个重点，强化保障和服务支撑，把民生保障的底进一步兜牢。更加注重以文化人，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全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让老百姓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推进平安辽宁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明确责任、到底到边、见人见事地抓好基层治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社会治安等工作，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安宁。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政。党的二十大以来，我们坚决扛起管党治政责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政，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实